



著 | 許 舒 (James Hayes)

譯 | 林立偉

新界百年史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新界百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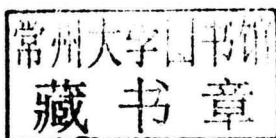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著 | 許 舒 (James Hayes)

譯 | 林立偉



□ 印 務：劉漢舉
□ 排 版：沈崇熙
□ 裝 幀 設 計：高 林
□ 責 任 編 輯：黎耀強

新界百年史

□
著者
許舒

□
譯者
林立偉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16 年 6 月初版

© 201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16 開 (230 mm × 170 mm)

□

ISBN：978-988-8420-03-2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by James Haye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06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www.hkupress.org.
本書繁體中文版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授權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獨家出版，並在全世界發售。未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發行本書的任何部分。

謹以此書，獻給在新界民政署地政主任、

地政督察和聯絡主任職系服務的一眾友人同事。

諸位工作忠心耿耿，知識經驗兼備，

實為部門及前香港政府的寶貴資產。

高馬可序

許舒對香港的新界瞭如指掌，在這方面能與他相埒的學者屈指可數。許舒在 2006 年版《新界百年史》的序言中說，他看待這個地區的事件時，總是從兩個角度出發：一是政府官員的角度，另外是歷史學家的角度。這種眼光令他能整體地看新界，而非只聚焦於某個鄉村。不過，許舒的研究最顯著的特點，在於他致力探討的是新界本身，而不是像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70 年代末中國「開放」前許多人類學家那樣——是為了解「傳統」中國農村社會。許多「農村研究」常見的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也不見於許舒的著作中。雖然他承認自己偏愛新界鄉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但《新界百年史》是翔實和平衡的研究，探討新界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情況，並不是為號召大家起來支持所謂的「原居民」社群。

《新界百年史》最主要論述的是變遷。例如許舒記述了客家話的衰落，他注意到以粵語和英文為主的公共教育普及後，客家話變成主要在家中使用。在南丫島，村民的生計到了 1950 年代末從近岸捕魚變為養豬。在大嶼山的貝澳，新道路和巴士服務帶來更多城市人和度假屋，而歐籍人士則開始經營餐廳和咖啡館。對許多村民來說，由 1920 年代起至 1970 年代為興建水塘而大量搬遷和重置鄉村的計劃，令山川景物和生活方式徹底改變。移民海外（主要是英國）也對鄉村造成深遠影響。到了 1980 年代末，新界某些地區與香港其他部分，已經幾乎看不出有太大差異。

許舒指出 1980 年代初新界的勢力平衡如何開始變化，尤其有助於我

們了解這個地區甚至直到今天的政治動態。推行地方選區投票，以及來自市區公共屋邨和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壯大，造就了新類型的地區領袖。區議會全面直選後，能夠保住權力的原居民寥寥無幾。在 1997 年香港回歸前後，有關原居民權益的爭議令許舒為之慨嘆，他歸咎於鄉民的保守思想和城市人對新界的無知。到了新界租約終結之時，許多非鄉民在新界擁有或租住房屋，在某些地區，人數甚至比原居民還要多。

此書也可說是關於殖民主義的著作，殖民主義這個成分，在許多有關新界的「中國性質」(Chineseness) 的研究中付諸闕如。殖民地政府高官駱克 (James Stewart Lockhart) 在 1898 年 8 月調查過這片新租借地歸來後，用「巨大差異」來形容新界居民與香港居民之間的鴻溝。當時英國人佔領香港已超過五十年，駱克十分清楚新界與香港之間的差異，以及這可能為殖民地政府帶來的問題。新界領袖在 1899 年大力反抗英國統治（這是夏思義 [Patrick Hase] 的《被遺忘的六日戰爭》的主題，也是由中華書局翻譯出版），但政府還是決定依賴地方領袖，許舒歸功於總督卜力 (Henry Blake)。在愛爾蘭當過警察和常駐裁判官的港督卜力，在武裝反抗平息後決意專程與那些地方領袖親身會面。在 1899 年末開始的首次土地丈量，自然也有深厚的殖民聯繫——執行這項工作的人，是從印度測量局借調來的歐籍和印籍人員。

如許舒在 2006 年版的序言所說，對於撰寫《新界百年史》的辛勞，他「甘之如飴」並希望藉此「稍為回報香港帶給我的一切」。香港人——無論是鄉民還是城市人，無論是土生土長的人還是初來乍到的人——全都應感激許舒，因為他提供了關於這個迷人地區豐富多采的記述。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

中文版序

直至二十世紀前四分之三歲月結束之前，新界都是香港的鄉野地帶。在 1957—1987 年間，我斷續地在新界的地方行政機關工作，¹ 對於這個地區和當地原居民一直懷有特別興趣，寫了很多關於他們的著述。在此之前，這些筆墨都是以英文發表，雖然牛津大學出版社在 1993 年為我出版的一本關於荃灣的書，在 1999 年曾翻譯成中文。

我十分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有意翻譯出版我最後一本專書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此書英文版在 2006 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中譯是根據 2012 年再版的平裝本譯出，平裝本收入一篇新序言，述說過去五十年間香港和新界的民族誌研究。

中華書局決定譯刊此書固然令我欣喜，他們還建議納入更多關於往昔歲月的歷史照片，我遂趁此機會加入了許多照片，作為插圖以配合 2012 年版序言所描述的民族誌，例如有些照片是關於種植稻米和其他活動所用的器具，這些活動是舊日新界鄉野漁農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內文也有所增補，包括在註釋部分最後加了幾項新資料，還增添了

1 最初是在 1957—1962 年，在全然屬於鄉野的地區任職理民府官；之後在 1975—1982 年調到另一個地方，擔任市鎮專員兼理民府官，當時此地正經歷發展的陣痛，將成為香港首個「新市鎮」；最後是 1985—1987 年，我肩負總攬新界地區行政事務之責。

兩個附錄。

「附錄一」是關於 1972 年圓墩村遷往青龍頭海邊的資料。本書英文版的第七章和第八章略去這段記述，因為這次搬村與其他不同，既非因水務計劃，也不是為發展「新市鎮」。它是「絕無僅有」的，是因為 1950 年代大欖涌水塘和水務計劃興建輸水隧道後，稻田的地下水流失所致，這種類型的搬村僅此一例。

圓墩村遷走後，舊村址和昔時村田都撥交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使用，民安隊把這個地方變成訓練中心，在 1977 年 4 月 19 日由時任港督的麥理浩爵士（後來為勳爵）揭幕。荃灣鄉事委員會出面呼籲荃灣村民捐出的農具藏品，多年來都放在這裏的舊村屋中展示。「附錄二」描述其來龍去脈。

最近向民安隊查詢後得其告知，這套藏品至今仍保存在民安隊圓墩營的舊大村屋中。但民安隊高級行動及訓練主任（新界）說，圓墩營的民俗博物館只供團體參觀，並須提前四星期預約申請（電話 3651 9350）。

參觀博物館的訪客須利用自己的交通工具，惟要注意，通往圓墩營的道路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深井管理站管理，須事先獲該管理站發出特別通行證方可使用。

最後，要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助理總編輯黎耀強先生，以及譯者林立偉先生協助，令中文版順利面世。而本書付梓，亦得益於友人高添強堅定不懈的支持，及其對今昔香港的廣博知識，在此謹表謝忱。

回顧過去，我一直致力了解香港的人和事，特別是曾屬農鄉的新界及定居已久的村民，再次體會到儒家著名格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智慧。我所知一切關於鄉村社群、舊有的生活方式和想法，均來自在近

六十年的探究之中認識到的眾多良師益友。最佳導師，莫出其右；為此再次向他們全體言謝。當中的主要人物，是來自南大嶼山貝澳的溫安先生和荃灣油柑頭的楊百勝先生。特別感激兩位長久的友誼，以及歷年來之多番襄助。文中如有任何錯漏，責任在我，自不待言。本人熱切期望，此書有助讀者更加了解新界的過去現在，並縮窄由來已久、現仍留存的城鄉鴻溝。

許舒

2016 年，悉尼

平裝本序

此書最初於 2006 年出版，原本的〈序〉為讀者介紹在新界世居很久的部分人，新界在 1898 年成為香港一部分，到今天人口已稠密了許多，經歷超過一世紀的滄桑變遷，它的故事豐富多采，我也在那篇〈序〉中加以述說。這本平裝本主要是重印舊作，書中文字、註釋和插圖不變，只是第 45—46 頁和第 335 頁有所增潤，以補充一些與內容有關的新資料，還有幾處小修訂，這篇為 *The Great Difference* 平裝本而寫的新序，並非要取代或者擴充舊序。

然而，出版社叫我提供一篇新序，使我能趁此機會彌補可稱為《巨大差異》（英文書名 *The Great Difference* 的直譯）中的「巨大遺漏」，其他關於新界的專書幾乎全都有此缺陷。我是指它的傳統物質文化，尤其是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用的器物。我過去曾就這個題目的研究撰寫文章，至今仍然深感興趣。這篇新序會說明這種表面上的忽略背後的一些原因；而儘管如此，涉及它們的著述數量仍不少（還有為數可觀的博物館藏品），頗令人振奮，這裏也會加以回顧，並指出我們可以採取哪些方法來改變局面。

對於物質文化的研究，主要屬社會人類學範疇，¹ 但如文思理（Sidney W. Mintz）在近期文章〈魚類、飲食習慣和物質文化〉（“Fish, Food Habits and Material Culture”，載於《香港人類學》〔*The Hong Kong Anthropologist*, No. 9 [1996]〕）中說，人類學家對於物質文化的興趣，在二十世紀後期普遍下降。他寫道，這甚至導致一些完全背離民族誌的趨勢，雖然據他憶述，在早期歲月他的同行有「研究物質文化的傳統」。在 1950—1960 年代的香港，華德英（Barbara Ward）和奧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的研究最能代表這個古老傳統，² 但在後期關於新界的長篇人類學研究中，這種傳統就不那麼明顯了。³

然而，過去五十年間研究新界物質文化的著述，卻不能說不可觀。

- 1 我撰寫這篇序言時，得到羅碧詩（Elizabeth Johnson）和詹森（Graham Johnson），華琛（James Watson）和華若璧（Rubie Watson），還有瑪麗安·福特（Mariann Ford）和夏思義（Patrick Hase）協助，在此謹致謝忱。另外，克里斯蒂娜·泰里（Christine Thery）慷慨容許我使用她的畫作，作為這本重印本的封面，也在此謝過。已故的香港人類學前輩華德英（Barbara Ward）在其權威文章“Rediscovering our soc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Territories”中斷言，社會人類學探討的事項，「通常也包括他們的物質文化和技術」（文章載於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0 [1980] pp.116–124）。
- 2 華德英（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和學生都稱她為「華姑娘」）主要研究新界漁民，奧斯古德的研究對象，則主要是香港島香港仔附近鴨脰洲上以移民為主的社群。見華德英過世後出版的 *Through Other Eyes,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9)，以及奧斯古德的 *The Chinese: A Study of a Hong Kong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hree volumes, 1966)。
- 3 華德英在上引的文章中，回顧了直至 1980 年左右的人類學研究，從中可見着重點的轉變，裴達禮（Hugh Baker）寫了一篇資料非常翔實的文章“The ‘Backroom Boys’ of Hong Kong Anthropology: Fieldworkers and Their Friends”（載於 *Asian Anthropology*, Vol 6 [2007], pp.1–28），其附錄的清單列出全體人類學家和他們的田野研究代表作品，這清單也佐證了這種情況。這個大趨勢中的例外情況，可在他自己的 *Ancestral Images, A Hong Kong Collection* 找到，香港大學出版社最近重印此書，但最早是由香港《南華早報》在 1979–1981 年間出版；另外，波特（Jack M. Potter）的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簡略書名，見此書參考書目，第 375 頁）第三章是較早期的例外，該章載有屏山從種稻過渡到種菜期間，當地農業經濟和設施的資料；還有華琛（James L. Watson）在 1975 年關於新田文氏的研究（書目第 382 頁），他花了一整章（第 30–53 頁）談文氏與鹹水稻田的獨特生態關係，以及這種生態系統在 1970 年代的消失。

這主要來自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其他學科學者的工作，也包括少數人類學家，他們把成果寫成短文和論文刊登於期刊。⁴ 這些文章有不少載於自 1961 年起每年出版一期的《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令它成為關於香港傳統職業和物質文化資料的重要寶庫。這本期刊上最早期的文章，也包括我就此領域撰寫的著述。我在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從事研究，當時新界主要仍是鄉野地帶，我在履行職務之餘，盡量關注周遭環境。研究題目包括本地農業和鄉村近岸漁業、製鹽、麻和藍草的種植、流動織布師、鐵匠和泥水匠、豆腐製作者、炭窯、香粉加工廠和製繩廠。⁵

多年來在《會刊》投稿的作者眾多，夏思義（Patrick Hase）是其中之一，他寫了一篇重要文章 “Traditional Lif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The Evidence of the 1911 and 1921 Censuses”（1996），還有一些資料豐富的短文，內容涵蓋稻米種植、鄉村茅廁與施肥，以及石灰窯。科大衛（David Faure）在 1982 年和 1984 年的《會刊》上發表了兩篇關於西貢和荃灣鄉村的長篇短文，都是源自他在 1980—1982 年於中文大學開展的口述歷史計劃，包含關於戰前歲月的日常生活的許多資料。薛爾法（Armando da Silva）的文章 “Some Notes on Ethno-botany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1969）應與他在 1972 年出版的研究專書《香港大嶼山調查》（*Tai Yu Sha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in a South Chinese Island*）一同閱讀。薛爾法是地理學家，書中對於稻米種植有詳盡的記述，在生態方面有鞭辟入裏的見解，因而特別有價值。

4 他們對物質文化研究的關注，見於一個更廣闊範疇的著述，那就是香港的社會人類學，裴達禮的 “Backroom Boys” 第 13—18 頁，題為 “The Anthropologists’ Friends” 一節有詳細討論。

5 這些題目有部分在我於 1977 年和 1983 年出版的最早兩本書中論及（*The Hong Kong Region*〔簡稱 HKR〕和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簡稱 RCHK〕）：見參考書目，第 364 頁；HKR 今年較早由香港大學出版社重印）。更多關於鄉村漁業的資料，見參考書目第 365 頁。

《會刊》的許多卷包含其他有用的文章。第二十四卷（1984年）資料尤其豐富，裏面有圖文並茂的文章講述后海灣和附近一帶的養蠔業、后海灣附近基圍（以基堤圍繞的池塘，靠潮汐收集和養殖海產）的結構和運作，還有關於新界傳統種茶業、配有插圖的短文；第二十九卷（1989年）則載有陳家恩的重要文章“Joss Stick Manufacturing: A Study of a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Hong Kong”。⁶較後期數的《會刊》繼續刊載關於物質文化領域的文章。⁷

其他關於物質文化的出版物，包括香港歷史博物館在1990年出版的《羅屋民俗館》（*Law Uk Folk Museum*）和《粒粒皆辛苦：香港的稻米耕種》（*Rice Farming in Hong Kong*），到了1990年代中期，那時剛成立的區域市政局博物館出版了圖錄《細說鄉情：新界文物徵集大行動》（*History from things: New Territories Relics Collection Campaign*）。這個文物徵集活動是由區域市政局舉辦，獲得新界鄉議局和各鄉事委員會協助，在1993年3月開展，據說結果收到六千多件捐贈物品，這批藏品會放到即將開幕的沙田文化博物館。⁸另一個記錄物質文化之舉，是歷史博物館在1995年舉辦關於市區和鄉郊已消失行業的展覽，一年後出版《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到了更近期，羅碧詩（Elizabeth Johnson）受香港文化博物館委託，撰寫 *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6 魯道夫·霍梅爾（Rudolf P. Hommel）的《手藝中國：中國手工業調查圖錄》（*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9, reprint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1937]），是關於傳統產業的巨著，而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的相關部分，可與之互補。

7 刊於第一至二十卷的文章，可在印刷版的總索引中查尋，其餘可在網上搜尋。

8 區域市政局與歷史遠較它悠久的市政局，在1997年後不久被新政府廢除，自此政府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成為掌管全港所有博物館的機構。

Research o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一書，於 2000 年付梓。⁹

結果，1990 年代是這些博物館在這方面工作的高潮。他們的蒐集和研究努力來得正合時，因為市區和鄉郊已出現大規模社會經濟轉變和廣泛都市化，而且這現象在新界最為明顯。本書第五至十章正文描述了新的生活和謀生方式取代舊的，經濟有餘裕的家庭會興建有現代設施的新屋，一切來自過去的事物都被唾棄和扔到一旁。經過幾百年來遵循同一古老模式的農村生活，現在急速追趕現代化，變化得面目全非。事實上，博物館人員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仍能從新界蒐集到這些文物，令一位博學多聞的人類學家感到很驚訝。這是運氣使然，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由於人手和財政限制，並且長期受到壓力要不斷舉行公眾展覽，所以他們一直難有充足時間去蒐集、記錄和研究物質文化。

兩間博物館的館長職系人員繼續從事本地歷史和民族誌範疇的工作，有時候獲得外界學者協助。不過，在過去六年，對於物質文化（我們可以稱之為「有形的」文化遺產）的研究再次變得黯然失色，現在退居次要地位，居首位的是恢復和保存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大多是關於傳統節慶和相關的儀式和表演。這是屬於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支持的運動，並得到國際公約正式確定，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是締約國，這項工作在香港和新界的文化領域佔據主導地位。¹⁰ 尤其矚目的是，2009 年 12 月 1—4 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名為「非物質

9 出版此書原是供高中生和大學生閱讀，其內容來自非常廣泛的調查，對我們很有幫助，完全應有更廣大的讀者，並且應該重印，以令更多人得睹此書。

10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在 2003 年 10 月 17 日的大會上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得到三十個成員國批准後，於三年後正式生效。關於香港的執行情況和細節，見香港文化博物館網頁。

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的國際會議。¹¹

在這個頗令人洩氣的背景下，得知文化博物館現有民俗藏品逾二萬件，委實使人精神為之抖擻。如同 1993 年的情況，這些數目龐大的新增藏品，主要是由新界居民捐贈，博物館員工在當年推動的徵集活動很成功，新界居民知道他們有此需要，所以繼續捐出文物，充實這座博物館的藏品，顯然覺得這樣做總好過把舊物丟棄，或任由它們在廢屋和附屬建築中腐朽。我沒有這些物品的分類細目列表，但它們大部分都拍了照，登記在博物館的電腦資料庫中，稱為博物館館藏管理系統。¹²

這個數量龐大的館藏，明顯需要仍致力鑽研物質文化而又感興趣的學者，與文化博物館的館長職系人員一同去研究；可能的話，還要尋找和訪問少數仍然在世、熟悉情況之人士。

趁這種機會仍在，就應加以把握，這點十分關鍵。器物本身無論怎樣珍貴，終究只是死物，除非我們可以重現它們的實際環境和精神背景，以及它們所體現的積累知識。例如關於郊野資源的知識，什麼東西是有用的，應去哪裏找，本書第 171—172 頁引述基思·艾迪生（Keith Addison）的段落，喚起我們清晰的記憶。另外也想一想在農曆新年時，遍貼香港鄉郊地區建築物和農具上的紙符；如 1960 年代 Ronald Ng 在東涌所記載，牛生病時，掛在牛脖子上那種「得到鄉村廟宇祝福，摺成三

11 見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與香港文化博物館在 2011 年出版、廖迪生主編的雙語刊物《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當中第二、七至八、十六至十七篇論文是與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

12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電腦資料庫包括每件物品的基本資料，如名稱、時期、尺寸等。由於它包括捐贈者和其他保密資料，所以放在內聯網，只供館長職系人員和協助他們進行獲批項目的學者使用。現在該館沒有計劃把資料庫全面公開，因為這需要很大資源。所有資料都是蒙該館總館長提供。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收藏了少量新界的日用器具，可以用收藏者 Elizabeth L. Johnson 的名字，通過互惠研究網絡（Reciprocal Research Network）在網上搜尋其照片和資料。

角形的紅紙」；以及村民與土地公和許多其他地方神祇的密切關係。¹³ 我們在這裏看到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互動，兩者融為一體，而且事實上不可分割，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農村社會以宇宙論為中心的心態，這是這種社會的重要特點。

除了亟需有人去研究，我們還有另一個迫切需要。那就是，我們今天早該有一本像歷史學家蘇珊·韓利（Susan Hanley）筆下《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暗藏的物質文化寶藏》（*Everyday Things in Premodern Japan: The Hidden Legacy of Materi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那樣的著作。文化博物館度藏的新界文物中，有許多我們的「暗藏文化寶藏」，應配合已發表的著述，再加上可以進一步做的訪問，製作一本這樣的書。它本身很有價值，也可以完美地與該博物館的上述出版物 *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互補。

雖然文化博物館近期沒有計劃出版此領域的新書，但總館長重申，他們一直歡迎學者提出合適的研究計劃，以充實關於館內藏品的資料，並促進公眾對其內容的認識和欣賞，所以樂見學者提出有關項目和出版的計劃。繼續談這裏倡議的書籍計劃，該館發出的這個長期邀請，應由年輕一輩的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其他感興趣的學者來響應和承擔，與館長級人員緊密合作研究藏品，賦予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上文指出的聯繫，出版所需的額外撥款，可申請為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設的財政資源資助，這要求似乎很合情合理。¹⁴

13 關於這三個指標，見 HKR, pp.212, n112 和 p.148；以及 RCHK, p.11 和第十、十二、十三章和第 134 至 135 頁的照片部分。另見拙著 *South China Village Cultur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7-49。

14 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見文化博物館網頁。為了促進研究，並令香港以外更多人認識這個重要館藏，或許可以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基金擴大，用於令該博物館的資料庫經過適當篩選後，放到互聯網上全面公開，並加入歷史博物館的藏品。

在這方面而言，我們不應忽略香港歷史博物館的藏品。雖然文化博物館在 2000 年成立後，歷史博物館的重點就放在市區多於新界，但它的藏品中，也有許多早期蒐集得來的珍貴器物，它的物質文化收藏，應包括到我在這裏大力倡議的聯合研究和出版計劃之中。¹⁵

如能做到這點，就可以把這些「暗藏的文化寶藏」恢復到新界歷史記錄裏的應有位置，成為「巨大差異」中的重要一環。

許舒

2012 年 5 月，悉尼

15 歷史博物館網頁上關於「民俗」藏品的解說提到「農具、家具、農村及漁民日用器具、捕魚裝備、漁船模型」和其他相關物品。該館藏品現在已全面數碼化，但和文化博物館的資料庫一樣，只供內部使用。不過，現在已有愈來愈多個別物件的資料，放到該館的公開網站上。雖然還沒有出版專書，但近期出版了幾本與專題展覽相關的圖冊：2009 年的《摩登都會：滬港社會風貌》（*Modern Metropolis: Material Culture of Shanghai and Hong Kong*）和 2011 年的《歷久常新：旗袍的變奏》（*The Evergreen Class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Qipao*）。此資料蒙該館總館長提供。

我在此須補充一句，對於這篇序言所表現的觀點，兩位總館長都無須負任何責任。